

谁来为择校费问题负责

择校费在中国何以泛滥?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涂艳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教育政策是主要原因。”他对此展开了分析:一是上世纪50年代产生,80年代强化的重点学校制度,优秀的师资、生源及优惠政策明显向重点学校倾斜,由此加剧学生的入学竞争压力,聚集了优势教育资源。

二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的择校收费制度,它打破了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使得家长地位、经济能力成为影响子女进入不同学校的重要因素。

三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转制学校制度,“转制学校”将大量教育质量较好的公立初中和小学,转变为高收费的学校,剥夺了人民群众享受低收费教育的机会,使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公益性受到极大的伤害。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择校费未能得到教育部门的承认,一直处于“地下”状态,被列为乱收费。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要求对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现象予以治理。同时,不批驳也不承认高中择校行为。

1997年,国家教委印发《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的意见》;2000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国中小学收费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意见》,都欲整治择校费问题,但难见实效。

与此同时,中国的中产阶层开始形成。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萧灼基指出,未来经济发展中愿意并能够承担择校费用,会大量出现于收入在10万元以上者,在他看来,只要家庭收入达到甚至略低于这个数,家长将不太犹豫地为孩子择校投资。

萧灼基认为,这个阶层自身的发展经历和周边的环境影响,使得他们对于教育有格外深刻的认识和追求。在各择校群体中,他们心情最迫切也最肯投入,从而成为各类学校招收择校学生的首选群体。

这个群体在社会中有着较为特殊的地位,无论从工作还是社会关系上都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成为择校市场上的“庄家”,其举动影响这个市场的涨落,而目前正在看涨。

目前的择校,实质上被学者称为是教育消费价格双轨制的市场价,造成这一行为的社会根源在于沉重的就业压力和劳动就业制度问题,促使人们竞相追逐优质教育机会;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和社会收入差距的明显拉大,以及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使择校、高收费成为必然。

一位教育学者认为,只要有个人利益最大化,只要有稳定偏好,择校依然会继续。而涂艳国认为,从表面上看,“择校”是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实

质是经济、社会发展在教育中的综合反映。

高考指挥棒也被认为是家长被迫择校的重要原因。

对学生来说,选择好的中小学才能进好的大学,而好的大学意味着好工作——择校问题的实质就是择业问题。

对此,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一中校长赵洪武认为:“中国基础教育的应试体制,直接导致了众多家长为孩子的前途,好中择好,优中选优,不惜花重金让孩子到重点学校读书。”如果我们国内不改变目前的评价体制,还是按照目前的中考体制,中学的素质教育很难推进。

教育的不均衡与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可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助长了“择校”之风。

更有学者认为,择校费的背后还隐藏着城乡差距、公民平等权利、国力基础、贫富差距、就业渠道等一系列的问题。只有当这些问题都一一解决的时候,择校费的问题才会真正消失,否则,它还是会以其他形式浮现。

一位教育媒体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遏制择校这个问题,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冲动最大,县、区政府没有能动性。因为这个钱归根结底是以县为主体重组教育经费,而择校费收入能帮它们缓解困难。

他分析:“由于对教育

的投入难以立竿见影,某些地方政府对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质量热情不高。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择校费就是地方政府对教育欠账过多的产物。正是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一些教学质量好的学校收取的择校费越来越高,无情地吞噬着义务教育的公益性。”

教育专家邵宗杰认为,近年来,各地把一些办得比较好的公立学校改制翻牌为具有民办性质的“国有民办”学校,向学生收取高额学费,这对“择校”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涂艳国认为,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多年来在国民生产总值的3%左右徘徊,远未达到4%。过去义务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结果变成了谁管理谁出钱,乃至谁上学谁出钱。

涂艳国说:“现在的农村地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虽然是一个重要进步,但学校的办学经费仍然十分紧张。长期的教育投入不足是造成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富裕地区学校与贫困地区学校以及强校与弱校之间差别的重要原因。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做的首先是反思自己是否尽到了为公民提供优质义务教育的法律责任,而不是把自己酿出的苦酒强逼别人去喝。”

摘自《南方周末》

去年夏天,单位组织我们去武夷山旅游。

下了飞机,我们到航站楼一侧,去取托运行李。

坐过飞机的人都知道,行李传送带有一部分露在外面,随着它的传送,一件跟一件的行李钻出来,乘客站在传送带旁边,寻找自己的行李。不用太多时间,行李都会送到主人手里,大家各自散去,波澜不惊。

那一刻,我有点走神,

“人类可能处在某个特殊阶段,这样快的演化速度,在人类演化史中,已经很久未曾出现过。”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基因学教授哈彭丁、犹他大学的考古学家霍克和犹他大学演化生物学家克汗等人认为,大约从四万年前开始,人类加速演化。大约一万年前,农业兴起,人类的演化速度进一步加快。

这一结论引起强烈反响。此前,科学家们普遍认为,人类演化在1万年前到5万年前之间,就已近乎停止,有些演化生物学家甚至认为,从最后一个冰河世纪开始,人的大脑再也没有演化过。

人口越多变异越多

1万年前,地球上的人口大约只有几百万。到公元一世纪,人口数量增加到了2亿。1700年时,这个数字变成了6.2亿,到了今天,则超过了60亿。智人终于成为世界上分布最广的物种。

“这是人类的神奇之处,没有物种的数量增幅能与人类的相比。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只是蜷曲在非洲的一个角落里,毫无数量优势可言。在那个时候,人类基因的发展并不快。”这项研究的另一参与者霍克说。

“相对来说,5000年只能算是一段很短的时间。”霍克说,“这大概相当于100到200代人。不

机场行李无人拿错

没有机场工作人员组织大家排队,也没有保安在旁边监督,大家眼巴巴地盯着传送口中,盼着自己行李早些出来,竟然没人拿错,也没人故意拿错,更没人动邪念。

为何秩序如此井然?我发现了一些门道。表面上看,现场没有人组织大家排队,也没有保安监督,

实际上,那条传送带就是一个排队组织者,使乘客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两侧,去取自己的行李。

更重要的是,现场看似没有监督者,其实,每个人都是监督者,之所以没动劫念或偷念,是因为谁都无法判定,要下手的这件行李是谁的,也许某件行李的主人没有过来,我

们可以下手,但是,我们不可能知道他没过来,我们只能先判定他就在自己身边,你一下手,他就抓你个现行。

没人组织排队,等于有人组织排队;没人监督,等于人人都在监督。这种设计要是用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会产生多大的效果呀。当然,这取决于我们是不是在阳光下做到公开和透明。

摘自《当代工人》

人类正在加速演化

过,这期人类基因的演化也是明显的。近5000年来出现的优势基因被不断复制传递,现在全世界大概有30%到40%的人拥有这批优势基因。”

这符合达尔文理论的一条基本规则:人口越多,演化越频繁。用基因学的方法分析达尔文的话,就是:当新人出生的时候,DNA变异同时诞生。新人越多,被保留下来的基因变异也就越多。

哈彭丁等人则分析了人群中普遍存在,但历史并不久远的基因。人类所有基因的7%,也就是大约1800个基因,是有利于人类演化、快速进化的基因。“人口数量的猛增与文化生态的剧烈变化同步进行,这为适应演化带来了新机遇。”研究者们强调。

“事实上,过去1万年中,出现了很多与新的饮食、疾病有关的基因形态。”

哈彭丁进一步预测,随着人类环境和饮食的稳定,基因进化应该会放慢速度。但是,另一方面,人口越多,群体越稳定,那么人群中的传染病也会变化得越频繁。这一因素会给人类的演化带来不确定因素。“可能需要一会才会稳定下来。当然,这里

上万年的时间。”

饮食决定演化方向

美国科学家的研究还进一步带来了更多的震撼观点。在他们看来,尽管所有人类的DNA都是几乎完全一样的,但各大人种之间的差距还是在不断加大。“我们正变得越来越不同。”哈彭丁说。

这7%的快速演化基因中,并非所有的都已经和特定特质一一对上号,但还是有一些联系被找到了。

他们发现的例子包括,控制色素沉淀的基因让高加索人种选择了浅色的皮肤、蓝眼睛和黄头发,也让蒙古人种选择了浅色的皮肤。“亚洲人和欧洲人都是皮肤颜色变浅了的非洲人,但这两个人种皮肤变浅的程度并不一样。”哈彭丁说。

此前,大部分的人类学家都同意人种之间生理形态出现差异的原因,是因为在人类从非洲走出来后,为了在较寒冷、也较少阳光地区更好地合成维生素D而逐渐选择了较浅的肤色。

另一个例子与牛有关。石器时代的人是不喝牛奶的,因为牛奶中含有一些特殊的乳糖,人类普遍缺乏消化这些乳糖的能力。不

过,近8000年来,欧洲人逐渐发展出了能容忍乳糖的基因,这样就使欧洲人开始接受了这一食物。

研究者指出,在东亚以及非洲大部分地区,人们依然无法很好地接受牛奶,很多人一喝牛奶就因为消化不良而腹泻、腹痛。而在北欧地区,能吸收牛奶的乳糖酶基因逐渐形成,因此几乎人人都能顺畅地享用牛奶。霍克解释,这一基因通常情况下是会随着人长大而消退,停止运作的,但如今现代人天生的这一机制却说明了人身上发生新的演化,而这还导致了欧洲北部的畜牧业比地中海地区和非洲等地更发达。

哈彭丁认为,很多类似的演化都和人类饮食的变化相关,这正好说明了农业出现,人类饮食改变对演化产生的影响。比如,欧洲人消化谷物会比较容易,但非洲南部沙漠地区的居民、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和美国的一些原住民却常常因为吃了高碳水化合物而得糖尿病。

“我们可以看到基因在改变,这些人正在本能顺利地消化谷物的方向演化。”哈彭丁说。

摘自《都市文化报》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 zzhwbh1616@sina.com

5月16日上午,担任中央电视台台长10年的赵化勇谢任,国家电视台的权杖传递到了焦利手中。这天召开的中央台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多数人对这个消息反应平静。会场之外的央视大楼里,CCTV这部庞大机器运转如常。

10年前的1999年,赵化勇的前任杨伟光从台长任上退下时却着实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震动。

直到现在,央视的老员工仍然怀念那10年——1991年到1999年,中央电视台最辉煌的岁月。彼时CCTV是中国最具公信力的媒体之一,《焦点访谈》被时任总理朱镕基誉为“群众喉舌,政府镜鉴”。《综艺大观》是亿万观众周末的保留节目,《三国演义》、《水浒传》、《北京人在纽约》等本土电视剧掀起惊人的收视狂潮。

轰轰烈烈的年代过去了。去年中央台50年台庆,很多央视人翻看台庆画册,目光停留最多的,还是那10年间的风光。

3月23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2008年中国电视主持人公众形象调查评比中名列第一,杨伟光为他颁奖,白岩松说:“我和在座的很多主持人都是杨台的作品。我很高兴由杨台来给我颁奖。谢谢您。”

英国王子安德鲁(查尔斯王子的弟弟)来中国访问,随行带着刚高中毕业的大女儿尤吉妮公主。我有幸在北京请他吃了女王晚餐,再次见识到了英国的“皇家风范”。

今年早些时候,我们曾应邀到安德鲁王子在伦敦郊区的家吃午餐。那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母亲留下的乡村别墅,会客厅里几乎每一幅油画、每一件家具都有典故,宛如英国近代史呈现在眼前。保护传统是英国王室的重要职责,这也包括周边的田园风光。落地窗外郁郁葱葱的草坪上散落着数十棵百年老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那是几代人呵护的结果。英国皇室住进人高高在上,保

前台长杨伟光

现在仍活跃在央视荧屏上的一大批播音员、名主持人,以及幕后的众多制片人、导演,都是在杨伟光时代“出道”的。若不是当年杨伟光“发明”了全新的用人制度,打破事业单位的“编制”壁垒,他们也许就不能迈进央视大门,或者得不到重用。

当年倪萍34岁破格晋升高级职称,不少人反对,认为提得太快。杨伟光说了一句话:“倪萍担当的是和赵忠祥一样的工作,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已经承担起这个工作,而且没有人能取代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名额给她?”

即便现在已离开央视,谈到老领导,倪萍还是说:“我得谢谢他,我希望杨台健康快乐。”

采访中,杨伟光的知名“老部下”们,如崔永元、时间(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著名制片人)、李挺(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张子扬(第一位由招标产生的春晚导演)、徐俐(《中国新闻》首席主播),对他说得最多的就是“用人不拘一格”、“任人惟贤”。白岩松说:“我觉得杨台是个能把握方向的人。”

公主像个邻家女

守刻板印象,但安德鲁王子一家却让人容易亲近。

虽然王子前些年已与妻子莎拉·费格森离异,但两人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官邸中随时可以看到一家四口的合影。在两个女儿的教育方面他们有商有量,前妻带朋友来访,王子也以礼相待。怪不得英国媒体把他们称为“世界最佳离异家庭”。午餐安排在靠近花园的餐厅里。门口有穿着制服的侍者,但王子一家人除了请他们端来饮料外,一切对客人的照应都自己动

那10年的主角杨伟光,不愿评判央视如今的纷纷扰扰是非非。年逾古稀的他还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拍电视剧。做长镜头拍了很多,仍嫌不过瘾,退休后他创办“天地人传媒公司”,继续追梦。“天地人”最有名的作品是曾经在各地卫视循环播放的情景喜剧《家有儿女》。泡上一杯绿茶,关掉灯,拉上窗帘,坐在大液晶电视前审看成片,是他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

他的着装随意朴素,随身带一把梳子,闲下来就梳几下头发,时刻维持着一丝不苟的面貌。

作为一位副部长级老干部,他不打官腔、不摆官谱,没有架子。约访他的过程中,他都是亲自给记者打电话,事无巨细地商定采访时间、地点、谈话方式。走进他的办公室,他起身相迎;临走他送到门口,握手言谢。采访过程中,如果累了,这个很有童心的可爱老头会起身去逗一逗鱼缸里的金鱼。

他现在的办公室在京西的一幢普通大楼里,离央视约有10分钟车程。办公室的3面墙上挂着书法作品,东边挂着“紫气东来”,

很迎合风水;北边挂着“精品至上”,是他的座右铭;西边的颇有意味:“欲展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他说“穷”字实在不好,换作了“展”。又说,自己其实要感谢当年的“穷”:大学毕业那年,全班28个人,他是留京工作的7人之一,“直接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年最好的新闻单位之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的出身好,是贫农”。他笑着补充,“当然我成绩也比较好。”

他最津津乐道的,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到中央电视台的往事。当时,电台的境况好过电视台,时任广电部副部长郝平南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着实吃了一惊。第二天,他就去堵时任广电部长艾知生的门,希望不要调去央视。部长斩钉截铁:党组已经决定了,不会更改。于是他“空降”央视。有人不服,问他:“你会扛摄像机吗,会拍电视吗?”杨伟光说:“我不是来扛摄像机的,是来管扛摄像机的人的。”

现在他“管”不了那么多人了,不过在走道上,所有见到他的人仍尊称他为“杨台”。杨伟光很喜欢这个称呼。他说,在担任过的一系列职务中,他对中央电视台台长感情最深,“杨台”二字,是他一生最为荣耀的称谓。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参观故宫,还爱上了火锅。“能在上大学之前去看看世界,真是太棒了!”尤吉妮乐不可支。她的计划是花一年时间见见世界,同时申请大学,英国文学是她想报考的专业。“大学对这个专业的学生要求很高。我毕业的成绩差一点,所以要好好写一篇散文或许才有希望。”“以你的出身,上一所理想的大学还有问题吗?”“我可不想因为自己的出身占什么便宜,我要凭本事。比如有关大学的资讯,我都是和同学想办法去打听,才不会找爸爸帮忙。”这时的公主更像一位很有主见的邻家女孩了。

摘自《现代家庭报》

数年前,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宣布限制校外人员随便进校参观,不久,又开始限制非北大学生在北大教室中旁听。至此,一贯以开放著称的北京大学将大门死死关闭,里面只剩下国内的高考精英们。有几个已经逝去的先生可能会大呼侥幸了:幸好我生得早。

毛泽东 他先后两次来北大旁听,第一次是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第二次是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两次旁听,对毛泽东的影响颇大,甚至毛泽东在这里收获了他与杨开慧的爱情。

沈从文 1922年夏天,二十岁

几年前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征服》里,孙红雷扮演的黑帮老大,以其“凶狠”、“霸气”、“狂妄”征服了观众的心。

气势逼人而又有情有义的形象,成了孙红雷的金字招牌,也让他赢得了内地娱乐圈“第一硬汉”的美誉。

不过,戴在头上的,是桂冠,亦是紧箍咒。终于,随着《潜伏》热播狂潮的袭来,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孙红雷浮出了水面。他完全敛住了以往的张扬气势,变成了文弱、谨慎而又深藏不露的小知识分子余则成。

如此强烈的反差,孙红雷坦言这是极大的挑战,“我等这个角色等了很多年了。”

其实,改变在电影《梅兰芳》中已初露端倪。当时,陈凯歌导演找到孙红雷,请他出演“学贯中西”的文人邱如白一角。身边所有人都看不起,劝他:“你还是演‘大哥’合适,好不容易到今天这个位置,别再砸了。”

剧本里的一句台词,让他下了决心:“谁毁了梅兰芳的孤单,谁就毁了梅兰芳,就毁了京剧。”孙红雷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有

这些北大旁听生

的沈从文脱下军装,风尘仆仆从湘西跑到北京,住西四会馆,后来搬进银胡同,到北京大学做了旁听生。

丁玲 著名女性作家。毛泽东有诗赞其“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代表作有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散文《牛棚小品》,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左翼作家。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职务。1924年,二十岁的她来到北京,在北大旁听,并结识了同样是“北漂

一族”的沈从文和胡也频,后者成为她风雨人生的第一个伴侣。

柔石 有着短暂而了不起的一生,“左联五烈士”之一。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对他有很详细的记述。柔石是革命者,更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小说家(可惜他创作生涯太短了),留下了《二月》、《为奴隶的母亲》等名篇,均被改编为经典电影。1925年到1926年,该文学青年曾在北大旁听。

瞿秋白 现代著名作家、记者

做事做到极致

情怀的人”,他懂得梅兰芳的孤单,以及所有专注艺术的人的孤单。

结果,他把戏痴邱如白的“孤白”演活了。影片中的邱如白只有一个目标——完成中国京剧改革。为了京剧事业,为了梅兰芳,邱如白几乎癫狂,言辞了,房子卖了,母亲也气死了,自己的名誉更是早抛到九霄云外。

这是他演艺生涯中第一个知识分子形象。他把自己带入了邱如白,甚至有些模糊了生活与表演的边界。那夸张的遣词、叹息的口头,让人又惊又疑:这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穿着敞口花衬衫、戴赤金链子的“粗人”吗?孙红雷在竭力让大家忘掉过去的他,“把自己洗干净了”。父母都是教师的孙红雷,认为自己“骨子里其实是个知识分子”。

如果说在《梅兰芳》中的表演仍稍嫌张扬,到了《潜伏》,孙红雷终于摆脱了大开大合的冲动式表演,戏都在脸上,在表情里,不过,开拍第一周,孙红雷都没找到感觉。演余

则成到汉奸穆连城家里东敲侧击,孙红雷一扞下巴,斜眼看着对方,全然一副凶狠、霸道样子。导演忍不住说:“红雷,你还是忍气太强了,可余则成是放在人堆里就淹没的人。”

孙红雷突然就开窍了。余则成是个小人物,他平凡、低调、很生活化,有柴米油盐情绪,还有世故小人的一面,是能在那个年代真正生存下来的人物。

接下来,孙红雷调整了表演状态,还主动要求增加道具——戴一副黑框眼镜,好把眼睛里不自觉流露的“凶光”遮住。导演则认为不需要,双方争执不下。有一场戏,拍军帽发表发布会,余则成冒充记者采访,手拿相机,戴上眼镜。导演心想,记者戴眼镜也说得过去,就点头认可了。没想到,这场戏过了,孙红雷的眼镜再也

没有摘了,用手捂着跟导演耍赖,“我不摘,我就是不摘。”

后来看片时,孙红雷也承认,眼镜不过就是心里暗示,戴不戴他都完全控制住了自己:说话温吞缓慢,落座时拘谨小坐,刺杀汉奸时显得紧张胆怯,但又总能完美地完成任务。

从《我的父亲母亲》里的“雁过无声”到《永不瞑目》、《像雾像雨又像风》里惊鸿一瞥却令人印象深刻的配角,到慢慢坐稳“江湖老大”的头把交椅,再到现在演技的随心所欲、收放自如,孙红雷十年辛苦不寻常。

他说自己是个感性的人,从小酷爱琼瑶小说,说话也文绉绉;闲暇时喜欢回中文校园坐一坐,有事还哭鼻子——感性,不正是演员的重要素质吗? “我希望把心里的‘真’坚持到底……当你心中有了其他人,不再是只有自己时,你就找到了信仰,信仰其实是为你实现理想而坚守的准则;很多人问我活着是问了什么?我说:创造。”

“我是一个喜欢努力的人,我喜欢做一件事情做到极致。”说这番话时的孙红雷,才真正是个被岁月磨砺后不折不扣的“硬汉”。

摘自《青年文摘》

也承认,眼镜不过就是心